

## 第一章 导论

### 一 人的主体意识与历史记忆

历史学之所以在人类意识中至关重要，正是因为每个人都具有这样的意识，即把自己视为一个在一定时间历程中或多或少是基本同一、连续存在的实体。他对自身形象的判定常常包含着对过去的参照。这包括他的性别、年龄、家庭，以及他所属的家族、民族和宗教团体；还有他成长与受教育的地方、他的专业或职业。这些大都具有历史的内容。所以，如果他想到他的家庭，那他也会想到他的父母，也许还会想到他的祖父母；他属于什么民族则要根据他的祖先来确定。如果他是一个伊斯兰教徒，那他可能会受到某些特定历史事件的影响，如穆罕默德的生平和思想。正如我们十分容易就能感受到的，作为一个中国人实际上很难摆脱或漠视中国五千年历史和文化。而如果他要想了解这个世界上的某一个民族，那他所要知道的就不仅仅是这个民族所处的地理位置及现状，而且还应包括这个民族的历史变迁；如果他从事学术工作，那么他一定会想到一些伟大的人物，这些人物建立了他所从事研究的领域，标明了他用以评估自身学术等级的价值尺度。

每个人关于他自身的形象是由其记忆的积淀所构成，这一方面包括与之相关的他个人行为的体验；另一方面也包含着他对过

去的理解。毕竟，对于所有的人来说，只有把他过去的信仰和过去的经历保存在记忆之中，个性才可能稳定。而这里的问题是，为什么由记忆保存下来的东西是每一个人认识自己的重要部分？因为：记忆不仅贮存了个人亲身经历过的事件，而且还贮存了与他来往的年长者的记忆。年长者们的经历和他所接触过的不同时期留下的文字著述，使他能对“自我”的认识不但包括近期发生的事件，而且也包括他所未曾经历过的历史事件。因此，他家庭的历史、居住地区的历史、所在城市的历史、所属宗教团体的历史、民族的历史、国家的历史，以及他生活在其中的更大范围的文化历史，都提供了对他自己过去一个最为基本的了解。

由此可见，人是一历史性的物种。这其中的意义乃为，人不能不对其过去持有深沉的了解和自己独特的感受。所以，不奇怪，几乎所有古代文明初露晨曦之时，总有对过去岁月进行的记载，尽管这几乎都无不充满着浓郁的神话气氛。被记录的也一般是神，而不是人的活动。正如在历史学故乡的希腊，最早的文献《荷马史诗》就是一部以说唱的形式记述希腊远古时代神与人的传说。这一漫长历史阶段的史事，包括当时的社会生活、宗教生活、生产贸易和体育竞技等活动的一般状况，都被隐含在神话传说的背后。在古代中国，那些荒远时代的记忆也同样充满着神话的色彩。如殷周甲骨文中的“帝乙妇妹”、“高宗代鬼方”就是对当时一些社会活动的记载。由是，周初之人方说：“殷人有册有典。”<sup>①</sup>

我们对此的理解，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任何神话都是用想像和借助想像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 把自然加以形象化。”<sup>②</sup>那些神话所反映的，应当是人们的一种愿望和判断，这包括他们最初意识活动的成果，以及他们对自然和社会的最初认识。而“随

<sup>①</sup> 《尚书·多士》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3页。

着这些自然力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sup>①</sup>换言之，也就是说，只有当人们开始以人的意义取代神的意义，就有了最初的历史学。

在古希腊，公元前五世纪的希罗多德曾游历各地，足迹遍及小亚细亚、爱琴海诸岛、埃及、叙利亚、巴比伦、波斯帝国的腹地、色雷斯以及黑海北岸的西徐亚，以访寻历史足迹，考察当地的民情风俗，搜罗天下放轶旧闻。他说：“我的责任是在报道人们所说的一切，但我自己并不一定就相信这些事是真实的。”<sup>②</sup>在古代中国，公元前 722 年就有了较为完整的历史著述——《春秋》。这是一部经过孔子修订，并被视为中国史学创始的经典之作。《春秋》记事之法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年，有固定的编年体规范，是孔子得一百二十国史记，据鲁国史官的记录，加以整理、删订而成，其重要性是使当时一部分史事得以保存下来，并有一确切的年代。《汉书·艺文志》说：“周室既衰，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乃称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sup>③</sup>

由此可见，历史学的发生和发展是和人的主体意识紧密联系在一起，反映出的是人们对自身的认识不再通过某种对象世界，尤其是那些神秘不解的自然力量来实现，而是通过对自身的理性批判而得到不断升华。所以，即使是在今天，当我们步入历史学宏伟殿堂，人类的历史记忆就无所不在地提醒着人们——人的精神和成就具有彻底的多样性，应当掌握人类精神所具有的广阔潜能。同时，这也可认为，历史既是人类成就和不幸的记载，也是人类财富与缺憾的清单。历史的知识作为人类挺立高昂的精神意义就

① 《政治经济学批判 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113 页。

② 《历史》王嘉隽译 商务印书馆 1959 年版 第 691 页。

③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

在于，无论遇到任何困难或需对某种形势作出反应时，其方法和道路往往不止一个；面临的选择常常比我们预想的要多。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如果不能用明晰真实的历史将过去与现在联结起来，就极可能用含糊虚假的历史来完成它。因此，作为对每一个历史学工作者的严峻挑战，问题就是，究竟何为真实的历史意识？

## 二 历史是文明的进步历程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人们过去的行为并非在严格意义上都能视作历史。我们说，历史和非历史的人类行为，其区别从现象上来看就在于，倘若其行为是由人的动物本性所决定，即是一种自然本能的活动，就犹如人受凉打冷噤，天热出汗，为自然的过程一样，并不体现历史的内容；但如果这些行为体现的是文化、心理和人的思想，体现着道德和文明的发展，那么这些行为毫无疑问就是历史活动。恰如古往今来，无数人饮酒而醉，人们无须一一细究，更不必毫厘不爽地将其都载入史籍，但当汉高祖刘邦底定天下，群臣饮酒争功“醉。”这个“醉”就因其“拔剑击柱，帝盖厌之”，而有了历史的内容。

另一方面，从理论上来说，人类的行为倘若被视为历史，至少应具备这样两方面的特征。（一）与其他具有生命活动的物种不同，人是能够使其行为转换成自己意识的对象，因此他的行为是有意识的。这表现在他通过自己的实践去改造对象世界、去创造对象世界。而正因为人也是社会性的动物，每一个个体，只要他是正常地生活，他的生命活动就很可能与人类社会连续不断的自我实现、自我创造的过程相联系，并成为其一部分。所以，我们说历史应是人类有意识的创造过程。正如马克思曾说过的：“整个所谓世界史不外是人通过劳动诞生的过程；不过是自然界对人

来生成的过程。<sup>①</sup>在这个意义上，历史是以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为基本前提，生产力不断提高和发展，以及由此而相应发展起来和不断调整的经济交往、社会交往、政治交往与精神交往的实践活动。（二）“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sup>②</sup>正因为有了人，自然界才具有了历史的意义。空气、谷物、河水、木材、石油，就可能成为呼吸、食物、饮料、燃料的必要条件。

在这个意义上，人和自然、内在和外在、理性和感性、甚至自由和必然，就是一个不断调整的漫长过程。它们互相联系、互相作用、互相渗透。所以，历史又是文明不断演进的过程。试举人们的饮食为例，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人的自然生理活动。但在上述意义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这些行为就反映着一定的文化心态和价值标准，反映着社会结构本身的内在关系。作为人们维持其生存的最为基本的方式，在中世纪的欧洲，人们饮食时常以手抓食，共用一个饭盆，同喝一碗汤。即使骑士餐桌上的戒律也不过如此——包括不要把嚼过的食物再放回盆里去，实在咽不下去的，就丢在地上；不要把咬过后觉得好吃的东西再让朋友尝；不要把鼻涕擤在桌布上，因为那是用来擦油手的；也不要擦在抓食的手上，而应擦在另一只手上。同时还不要大声啞咀；不要用刀叉剔牙缝。这反映出的是当时那个社会的心理、情感结构或文明素质，以及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但自十六世纪起，当一个更加森严的新的社会等级关系形成，专制主义和宫廷社会也就随之出现，那些新的骑士阶层不得不用一种更为敏感，而且也更为细致的方式去考虑和检点自己的举止，于是，人们一改用手抓食的习惯，并进而开始有了自己的餐具和餐巾，饮食方面的文化色彩也就越来越

① 《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31页。  
②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3页。

越浓。

但这样一来，旋踵而来的问题又有，历史是否等同于历史学；如果不能，二者的区别和联系又是什么？

### 三 历史和历史学的区别与联系

毋庸赘述，历史与历史学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同时又有着十分明显的区别。

就其联系而言，历史学是在历史进程中发生和发展的。当人类由自然进化进入到历史进化，就开始不断地否定自己的愚昧岁月。最初是自发、无意识，然后是自觉、有意识，并具体体现在人类通过改造世界的实践，形成了一个抽象的精神世界。在这里，对以往岁月的反思居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作为人类自身的历史活动，它又有着久远的源头。如早在文字产生以前，在人们口口相传的神话、传说、诗歌之中，总是把自己的祖先追溯到一个高贵而又神秘的血统。象中华民族的炎、黄二帝，希腊的奥林匹斯诸神。其普遍存在于历史进程中，正如十九世纪英国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所说：“在所有的人类中，没有哪一个部落会如此粗野不文，以致不试图叙述历史，尽管有些部落的算术知识还不能数到五。”<sup>①</sup>

随着历史的延续和发展，历史学也在不断地扩展和完善。逮至近代，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态度迅速地发生着令人目不暇接的革命性变化，反映出人类历史活动的不断深化。所以，历史和历史学都是作为人类的实践活动。相互之间的关系则有，现实的历史进程将规定和影响历史学的发展，历史学同时也反过来对人类的历史实践活动产生各种不同的作用。对此，英国著名哲学

张广智、张广勇：《史学：文化中的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第 17 页。

家罗素就曾说过：“希望人类不但有一个过去而且能有一个未来，如果人们十分强烈地抱有这一希望，并给予它一种动力，那么对历史的认识将成为最伟大的力量之一。”<sup>①</sup>

就其区别而言，是人类历史进程在每一特定的时空点上都很难被直接观察。因为大部分人们的过去行为并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和遗址，很多原本应值得人们永志不忘的历史事实似乎立刻就湮没不彰——如我们至今还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发明了弓箭；同样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人，在什么地方掌握了取火的技巧。事实上，大部分人类以往的历史进程都是模糊、且不连贯的，因而只有通过历史学，只有历史学家的研究和整理，一些历史的过程才可能为人所知晓。正如没有《左传》我们就很难了解和体察发生在三千年前春秋列国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方面的情况。由此，历史学与现实的历史过程区别就在于：

（一）和现实的历史进程不同的是，现实的历史进程很可能是人人参与，尽管绝大多数人都是不自觉、盲目地被卷入进去；历史学则是作为人类认识和反思自己过去的一种知识与思想的特殊形式，因而有着自己特定的一整套研究规则、技能、方法和理论。对人类以往历史的解释、对史料的梳理和分析就不能依据这一知识体系之外的好恶与情感，而要遵循历史学本身的内在规范，就和自然科学的物理、化学、数学等学科一样，历史学不是任何人都能说三道四，或没有相应学术规范的一般活动。

（二）和现实的历史进程不同的还有，历史学应更能体现人的理性和精神。在现实的历史进程中，相当一部分的人类行为实际上是愚蠢、野蛮乃至罪恶的。如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尤其是自工业革命以来，自然环境遭受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破坏，人们疯狂

《现代西方历史学译文集》，第 148 页。

地追求经济成长，以至空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昔日充满原始活力和美丽想像的自然环境即将荡然无存，这就表明文明的进步并非十全十美，无可厚非。但在历史学中，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应着重体现对这些罪恶、愚蠢、野蛮的否定、拒绝和批判，以及人类力图驾驭这一进程，尽可能避免或减少摧毁人类肉体 and 灵魂灾难性事件的所有努力。所以，具体的历史进程有时可能就是一系列单纯事件的序列，但对于历史学家而言，则要探究这些事件的内在涵义。尽管一些历史学家有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但历史学作为一个整体，这种精神则是长存和永恒的。

#### 四 历史学的内在矛盾与认识界限

历史学既然是人类反思过去的一种特殊的知识与思想活动，它和现实的历史进程并非同一，就使人们在进行历史知识活动时，常常会遇到这样一些内在的矛盾和认识障碍，大致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现象与本质的矛盾。现实的历史进程一般而言均是曾经发生，同时又是一去不复返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过程。历史学家对此的认识和理解显然就不可能象新闻记者那样，以直接的、第一观察人身份进行现场实况报道。相反，历史学家所关注的大都是离他们自己的那个时代较为遥远的过去。如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所记载的特洛伊战争，就是他出生以前六百年所发生的事；《史记》的作者司马迁“网罗天下放轶旧闻”，最早也都能追溯到他出生以前两千年前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状况。在这一点上，可以说，真正的历史学家决不会把自己的目光停留在那稍纵即逝的现实事件，刻意把握的是历史的跨度和力量。但就一些历史事件，尤其是距自己生活的年代相当遥远的历史事件而言，历史学家怎样才能从那一大堆孤立的时间、地点、人物

中寻求其内在的联系，即我们所说的历史意义呢？正如，要再现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场景和研究那激动人心的历史事件，那些保留至今、最为基本的文字材料能提供的恐怕也不过是一些编年的顺序。它包括法国公债在十八世纪七十年代起的居高不下、三级会议的开幕、第一次制宪会议的产生、巴黎人攻陷巴士底狱、《人权宣言》的颁布、路易十六被推上断头台、直到雅各宾派执政和被推翻，等等。它们的表面意义在于，这些事件尽管犹如戏剧一样起伏跌宕，但在历史学看来，它仅具有一般性的框架和轮廓，而缺乏真正深刻的历史性内涵。

所以，从最低限度而言，历史学也应“原始察终，见盛观衰”。但透过繁纷复杂的历史现象把握历史的本质，回溯因果之链，以图达到能引起人们灵魂震撼的深度与广度的同时，历史学家也极可能自觉或不自觉地对历史现象无视或曲解不利于自己历史认识的历史现象。例如杰出的瑞士历史学家布克哈特，在他影响深远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就把文艺复兴时代和中世纪截然分开；中世纪无比黑暗和愚昧。但近来的研究表明，中世纪并非就是一片文化的荒蛮和粗陋，至少那些默默无闻的修士们为保留、发现和传播濒临埋没的古代文明所作出的极其艰苦、不懈的努力，就使未来文艺复兴成为可能。所以，布克哈特的研究就因牺牲一些关键性的历史现象而遭受到了各方面的批评。但另一方面，对于历史学家来说，也可能会由于过分拘泥历史现象的原始真实性所能表达的有限历史意义，而不愿再进行任何更为深入的解释和评价。例如十八世纪中国乾嘉学派大师王鸣盛所言：“史家的记典制，有得有失，读史者不必横生意见，驰骋议论，以明法戒也。”<sup>①</sup>在他看来，“大抵作史者宜直叙其事，不必弄文法，寓予夺；读史者

宜详考其实，不必凭意见，发议论。”<sup>①</sup> 所以，纵观王氏一生，著《十七史商榷》一百卷，其考订辨析功绩固不可低估，但终因把自己只局限在考核典章故实的现象层次之内，其学术成就，即如他以后开一代学术风气的史学思想家章学诚所言，徵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sup>②</sup>，从而丧失了领略人类精神雄伟博大的勇气和能力。

其次是整体与细部的矛盾。在具体的历史研究过程中常常会由于人们以往的各种历史活动大都是个别、特殊和偶然的，一般而言不会重新出现，如梭伦改革、凯撒大帝、三元里抗英，都是在特定时间、特定空间发生的特定事件，所以，细部研究就是历史学一个十分重要的层次。正如研究中国古代政治制度，须从一系列具体问题着手。它包括皇帝制度、官僚制度、地方行政和中央权力机构，等等。实际上还可以进一步分解，如皇帝制度就有其发生、发展过程，它的道德基础和实际运作，以及与之相关的宫室、舆服、宗庙、陵寝和礼仪等多方面的内容。一般来说，可靠的研究方法当然是由小及大、由近及远、由粗及精。即：“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方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sup>③</sup> 问题是，既然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差异是细部研究的前提，但不论研究的角度多么微小，其中的差异性、偶然性、个别性仍难克服，因而没有可能穷尽它的无限分解。著名目录学家姚名达曾这样回忆王国维对此的看法，他写下自己当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当学生时，“课后，以旧在南方大学所考孔子适周究在何年求证于先生。是篇以确实之证据，摧破前人鲁昭公二十年，二十四年，二十一年之说，而断为七年或十年。先生阅毕，寻思有

① 《唐史论断》，《十七史商榷》卷九十二。

② 《文史通义》，《外篇》，《与汪庄龙书》。

③ 《资本论 第一卷第二版跋》，第3卷，第217页。

顷，曰：‘考据颇确，特事小耳。’<sup>①</sup>

另一方面，某些历史学家的学术实践又告诉我们，当历史学家在进行大跨度和宏观的历史研究时却也同样存在着某些重大的失误，很多宏论事实上更多的是以牺牲大量历史细节为代价的。德国著名学者马克斯·韦伯对文明的研究就可能是这方面的典型。在他看来，中国文明、印度文明、日本文明同为东方文明。在这一文明的体系中，古代中国曾扮演过十分积极的角色，很多文明的形式皆源于中国，传往日本、东南亚，甚至也包括印度。但如果进一步研究这三个文明形态，无论是从家庭结构、政治发展，还是从文学艺术、宗教信仰或社会等级制度来看，它们的相互差异恐怕比它们的相同之处更为显著。其相互差别在某些方面并不见得比它们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差别更小。所以，较为恰当地解决这一矛盾是进行具体的历史知识活动时又一难以把握的窘迫。

再次是历史和现实的矛盾。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有句名言，说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sup>②</sup>在他看来一切历史之所以具有当代性，是因为每一代人的历史都体现着这一时代的精神和思想。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历史只有到了文艺复兴才被人注意，被以一种新的精神重新观照，它体现的与其说是古希腊和古罗马历史，毋宁是文艺复兴时期人的思想和意识。所以，历史存在于史料和遗址中，但更重要的还是存在于这一时代的需要和追求中。在这个意义上，克罗齐的观点无疑有其合理性。尤其是这一思想，原本是针对当时欧洲历史学界占主流地位的兰克学派。兰克学派标榜“如实叙述”，认为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展现历史的真情，从而坚决地在史学研究中排斥任何道德和现实的考虑。正如一切思想都有其局限，兰克学派在推动欧洲史学的进一步发展时也带来了一些弊端，史

① 《衰余断忆》，《国学月报》王静安先生专号。

② 《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第 8 页。

学研究日益支离破碎。

所以，克罗齐旨在拨乱反正，但也同时反映出历史研究中存在着现实与历史的深刻矛盾。因为，历史不能简单地被视为现实，如果过分强调历史的现实性，并以当代所认定的价值和精神去重演历史，那么，历史研究也就很可能不是去发现真理，而是迎合这一时代的情感和思想。这种急功近利和立竿见影的实用主义，很可能就会使历史学家一旦看到与这一时代时尚不相吻合，或不尽一致的历史史实就会摒弃或曲解。而且，也应注意到现实在时间发展的链条中十分短暂和有限，任何现实存在的事物都会很快地被批判和扬弃，因而其时间性十分有限；历史学的全部深刻性、丰富性和有效性却恰在于贯穿过去、现在与未来。席勒说，历史学家充任的是世界末日审判的见证人。因此，能称得上伟大历史学家的，一定都具有“藏之名山，俟后世圣人君子”的胸襟。

当然，历史学家确又难以摆脱现实的存在。毕竟，他们都是现实存在的人，尽管可以立志脱离凡俗，但现实社会的思维方式、语言方式、情感方式、行为方式总会潜移默化地对其学术活动产生影响和制约。这也就导致那些力图根据确实的史料，实证过去事实、复原过去事件和状态的学术理念极不可能。所以，把握现实与历史的两极平衡也就是进行具体历史研究首先需要思考的问题。

## 五 史学思想的意义和范围

本质与现象、细部与整体、历史与现实，只是历史学作为一个专门知识体系架构内的问题，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中常常还会碰到一些有关历史深层本质的问题。毕竟，历史学存在的意义并不仅仅是满足人们茶余饭后的消遣，提供一些轶闻趣事，历史学理应有自己的学术和道德高度，以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责任。如是，

一些人类生存意义的深层本质，即历史的规律、偶然和必然、历史时间和历史中的道德判断，诸如这一类形而上的历史哲学问题，都需我们殚思尽虑。所以，历史学不是简单、平面的知识体系，它大致能区分为以下几个层次：

首先是史实的层次，它是所有历史知识活动得以展开的起点。历史学家在这里尽可能弄清楚将要研究的问题，其来龙去脉、演化过程，越清楚越详细越好。并在此之上初步形成自己的研究计划和问题轮廓，并确立自己解释这些问题最为恰当的基本概念。

其次是因果的层面，历史学家在这里的努力是尽最大可能从那些扑朔迷离、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探寻历史的规律，找出各种因素之间的内在联系。表述的语言和概念应有清晰的确定性，能够被其他历史学家学习、运用、讨论和验证。

再次是价值的层次，历史学作为文化的一种高级形式，无可非议地应和整个文化的进步保持内在的统一和逻辑的同质性。一个正直的历史学家恐怕很难象一个气象学家预报天气那样，描述人类所经历过的种种苦难，诸如奴隶制、殖民屠杀、灭绝种族等罪行而无动于衷。因此，历史学家又承担着价值守护神的使命和责任。

概而言之，都是史学的理论问题。所以，即使是最为具体的历史研究也有着它自己的某种逻辑程序，对每一个史料，历史学家必须要具有独创性和鉴别力，要问这个史料的基本内容是什么，何以成为证据，有什么意义？对内容有矛盾的史事还要加以比较、甄别、权衡；对于伪造的文件或史料记载的脱漏空白之处还须加以解释。可见，就是最为权威的史料也并非无懈可击，它的使用须经受过怀疑精神，以及相应规范训练的头脑加以审查。换言之，也就是说，任何史学研究都无法摆脱理论的制约和影响，都不可能不去思想，不设定一些基本的价值与准则。

那么，为什么不能直接从事具体的历史研究，从知识、史料

的积累中获得对史料处理的经验、以及对历史的理解，难道具体的研究不比抽象的理论提供给人们的历史认识和历史判断的历史信息更多？当然，很多伟大的历史学家都不是靠哪一个理论而成功的，尤其是近代以前的那些史学大师，如司马迁、希罗多德等人。但自近代科学革命以来，人类的知识以几何速率惊人地递增，分工也越来越细，就必须通过学校教育培养专门的人材，历史学同样如此。更重要的是，现代学术的发展也要求我们的研究凭借一定的规范才能进行。至少，在从事具体研究之前应对本学科有起码了解，正如学习中国古体诗，就必须承认李白、杜甫，并尽可能了解他们。否则一切都由自己摸索，一切都从头做起，那只得退回到周口店时代。

同时还应看到，中国历史学家大都缺乏理论的兴趣，不太注意寻找支配各种历史因素的历史内在规律。尽管，很多作品不容置疑地具有世界意义，但都不因其理论倾向和理论形态，所以中国历史学的整体水平很难有实际意义上的突破。就象医生的技能对治愈病人十分重要，但医学的进步却主要不是取决于医生们的经验，而是医学理论的研究。尽管医学理论在很多时候并不直接和病人有所联系；而且在治疗过程直接经验中获得的知识也极为宝贵，但一般不会导致医学上的重大进步。这就是为什么诺贝尔奖只授于那些在医学理论上有重大突破的伟大医学家，而不是那些杰出的医生。历史学似乎也可作如是观。就此，近代中国史学革命首创者的梁启超先生说，“自有左丘、司马迁、班固、荀悦、杜佑、司马光、袁枢诸人，然后中国始有史。自有刘知几、郑樵、章学诚，然后中国始有史学。”<sup>①</sup>可见史学理论的重要意义。

鉴于此，本书旨在讨论历史和历史学的一些相关命题，而不是一些专门领域的泛泛而论，它包括历史学的思想和一些基本的

<sup>①</sup> 《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年，第 24—25 页。

方法。因为在我们看来，“只有清晰的理论分析才能在错综复杂的事实中指明正确的道路。”<sup>①</sup>另外还需指出的是，作为本书的逻辑出发点当然是马克思主义。但今天对马克思主义确有很多不同理解，其中有些明显的是扭曲或误解。而我们则认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被称之为一个严密的、系统的、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体系，就是因为马克思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实现了社会历史观的一次最为重要的变革。更值得本书参照的是，马克思强调的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和革命的。”<sup>②</sup>而本书也力图由此出发，并相信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洞察历史深邃的本质，获得对一些历史问题合理的真知灼见。所以，本书刻意提供的，与其是一些现成的答案，毋宁说是一种理性的精神、批判的态度、一些最为基本的思想方法和研究技能。

《致康拉德·施米特 1889年10月1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282页。

《（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1873年1月24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8页。

## 第二章 历史的永恒变动

### 一 历史的特征是不不断变革

历史与人类其它存在形式一个极为重要的区别就是它的永恒变动。在历史的长河里，沧海桑田，物转星移；多少帝国此起彼伏，多少民族朝荣夕衰，个体瞬息即逝，祸福变迁不定，真可谓“万物皆流，无物常住”。

这里值得思想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在历史时间里没有什么能持续不变，并被人们很早所意识。尤其在中国古代历史思想中，对此的感受就十分深刻。《论语·子罕》有“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反映在社会政治层面上，就是《左传》所揭示的“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在这种历史意识观照之下，正如《诗经·大雅·荡》所说，“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即人们意识到只有从历代治乱的兴衰中寻求经验教训，方能作为鉴戒。而这背后的观念基础乃是对历史这一特征的认识和体察。所以，如何恰当地描述历史的这一特征就不能不是古代中国史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司马迁说他就是为了“网罗天下放轶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而著《史记》。

但在古代希腊，对这一特征的认识却形成了与古代中国史学完全不同的理念，至少在希罗多德以前都是如此。在他们看来，只

有永恒的东西才能为人所认识和理解，而历史的不断变化，稍纵即逝是不可能成为知识的。因此，德国哲学家尼采说，希腊人是反历史的。但即使这种反历史的思想也仍然建立在对这一特征的认识之上。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在历史中变化是永恒和绝对的，同时也是历史最为重要的特征。恩格斯曾对黑格尔的一句名言有过极为深刻的阐发。黑格尔 1820 年 6 月在他的《法哲学批判》一书中说，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但这部著作一出版就引起了相当矛盾的反应——近视政府的感激和同样近视自由派的愤怒。前者表现在普鲁士国家的阿尔腾施因大臣的一份贺辞中，保守的官方态度是：“我们认为，您使哲学具备了对待现实的唯一正确的态度。”后者却攻击黑格尔哲学的毒菌不是长在科学的花园里，而是“长在阿谀奉承的粪堆上”。<sup>①</sup>

但恩格斯在引述黑格尔的这一思想时却指出，这一命题显然试图想把现存的一切神圣化，是在哲学上替王室司法、替书报检查制度祝福，并把现存的形式视作一种普遍有效、永恒的伦理。然而，更重要的是，这一命题还可以从另一方面去理解，即我们所要阐述的历史唯物主义对历史永恒变动的思想。恩格斯说，既然，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以前一切现实的东西都会成为不现实的，都会丧失自己的必然性，自己存在的权力，自己的合理性，一种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现实就会代替正在衰亡的现实，那么，这一命题实际上又可以理解为：“凡是现存的 都是应当灭亡的。”<sup>②</sup> 因为，在历史唯物主义者看来，历史进程的特点就是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即不同的占统治地位生产方式的相继出现。它之

① 阿尔森·古留加：《黑格尔小传》商务印书馆 1978 年，第 113 页。

②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211 页。